

# 我国西医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传承研究

叶子辉,王兆良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西医传入我国百余年,取代了中医的主导地位,对我国医疗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传统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西医的传播中有排斥、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因而,探索西医传播对我国医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培育塑造新时期的医学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传承与发展;西医传播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3)03-246-004

**doi:** 10.7655/NYDXBSS20130314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价值的核心,萨顿提出“医学就是人学”即是说医学必须具有人文精神。现阶段我国医学人文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学界呼吁要“重塑”、“重建”医学人文精神,要求现阶段的医学院校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培育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理念。这就带给人们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医学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对近代以来西医在我国传播过程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传承发展进行一个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学界见仁见智。宫福清等<sup>[1]</sup>认为,医学人文精神“广义上是指固化于人脑中的医学人文价值观念;狭义上是指对于人类生命的敬畏与关爱以及对于人类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医学的发展始终以人类的最大利益为前提。”医学人文精神是对生命的极大尊重和爱护,是基于道德、伦理、哲学层面对人的充分理解与自觉回应<sup>[2]</sup>。我们认为,医学人文精神是固化在人思想中,关系医学与生命的人文品质内涵。这种人文品质内涵是指以人为本的疾病整体意识和敬畏生命、关爱生命的意识。

根据医学史对于近代以来医学传播的特点,我们以1949年为界,将医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发展相应分为三个时期:近代医学传播前时期(1835年前)、

近代西医传播初期(1835~1912年)、近代医学教育发展期(1912~1949年)。

## 一、近代医学传播前的医学人文精神

传统医学自公元前22世纪萌芽,经历四千年的发展,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文精神”的概念,但很多指导中医诊治和用药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蕴含着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念。这些医学人文精神不仅包含在医学书籍中,同时也呈现在各种文化思想中。所以近代医学传播前的中医人文精神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疾病治疗的整体观念

传统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整体诊治的观念,提出在疾病诊治过程中不能局限在疾病的本身,要考虑整个身体,做到辩证施治。《素问·疏五过论》中有“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萎臂为挛”<sup>[3]</sup>,反映出中医诊治过程中的整体观念。在诊治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治疗措施,将疾病的症状与人所处的环境相联系,体现了医学认知中的整体观念。

### (二) 济世的“良医”思想

传统医学中对于“良医”的追求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医生的技术追求,二是精湛技术基础上

**基金项目:**安徽省研究生“千人培养计划”;安徽医科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201003-09)

**收稿日期:** 2013-03-13

**作者简介:** 叶子辉(1991-),男,安徽泗县人,研究生在读;王兆良(1958-),男,安徽砀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信作者。

的品质追求。这种对于品质的追求着眼于两点:医生的选拔和对医生的社会评价。传统医学对医生选拔和医学知识的传授有着严格的要求,在传授医技之前必须考察他的品格和志向,考察培育良医的基础。晋朝杨泉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他对于“良医”的品格提出具体详实的标准和要求,要求“医者”必须具备仁爱、聪明理达、廉洁纯良等特点,才能具备医者的基本资格。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对医生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标准“能及大小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sup>[4]</sup>。这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认识,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他把治国者和医人者放在同一个高度,指出良医必须具有“行救人利物之心”的标准,为行医者提出了很高的价值标准。

### (三)“仁爱救人”、“济世活人”理念

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着中医学诊治,形成了“夫自古通天者生于本,本于阴阳”的观念<sup>[5]</sup>,要求在诊治中注重人与自身的和谐。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作为良医的考量标准,对医生医德的塑造和正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代,医学儒学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儒医”的概念,明确了儒家各种思想对于医生思想建设的作用和地位。明代陈实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明确提出儒家观念中“仁”对于医生修养的重要性。

## 二、近代西医传播初期的人文精神继承

西医自明朝中后期开始传入中国,而成规模的传播始于清朝后期。这种传播多以传教的方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扎根。近代医学教育发端于教会的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sup>①</sup>,随后依托眼科医局(1859年更名为博济医院)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近代医学院——南华医学学校<sup>[6]</sup>。这一时期的医学院校和行医人员主要是在教会的主持下,宗教的影响使得医学人文精神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 (一)上帝爱民的宗教行医理念

在教会医院和学校中,传教士在教授医学知识和行医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宗教的传播。传教士为了皈依民众作为信徒,在行医中把治病救人宣扬为上帝的旨意,“上帝能照顾到每一个信徒”。英国传教士郭雷枢(T. R. Colledge, 1796~1879)在澳门传教行医之后发表《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话传教士商榷书》,提出用医学来换取中国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信任。这种传教方式还体现在对中国学徒的医学教育中,对于第一代中国医学生而言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医院学校把基督教的“行医布道”、“社会拯救”、“灵魂拯救”等观念注入施医给药过程之中,这是一种近乎社会福利性质的医学诊治。如广州眼科医局和后来的博济医院,自设立之后对于所有患者都是免费施治。不可否认,受到宗教侵染的中国医学界,宗教传播的“兼爱”精神,提出的人与人和谐相处等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为我国医疗事业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 (二)“济世医民”的医学观

教会医院的广泛设立,学徒制到正规的高等医学教育,留学归国人员也渐渐增多,中国的西人数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伍连德博士自1907年回到中国之后,开始在国内行医育人。东北鼠疫流行期间,他带领中国的医务人员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消除了这场导致四万余人死亡的瘟疫,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鼠疫学术讨论会(又称“万国鼠疫大会”)。随后他又致力于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发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sup>[7]</sup>。第一代西医的背景大多较为相似,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有在教会或者商行学习工作的经历。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也进行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积淀的中国人或是留洋或是在国内通过教会学校的学习,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西方先进技术中,形成“济世医民”的思想。

## 三、近代医学教育发展期的人文精神传播

自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至1937

<sup>①</sup>明朝中后期开始,西医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这一部分西医传播只是吉光片羽,是自发且没有系统的。在1935年伯驾开设广东眼科医局之前,英国船医皮尔逊(A. Pearson)在广州为人们种植牛痘,马礼逊(R. Morrison)、李文斯敦(T. Livingstone)、郭雷枢(T. R. Colledge)等在澳门开设诊所,但当时澳门在葡萄牙人控制之下,我们以伯驾在广州开设医局为西医在我国正式传播为伊始。

年<sup>①</sup>,我国自办医学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在基督教传教中渐渐起步,此间发端的自主创办医学教育逐步形成规模,为中国医学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内忧外患中,自主办学的兴起、医学会的成立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极大促进了医学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精神在医学人文的应有之意上萌发出“救国”、“复兴”等理念。

#### (一)“教育救国”的医学发展理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传播促使国内有志之士觉醒,国人在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的同时,对西医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国内医学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纵使有些学校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消失在医学教育的序列中,但这样的医学发展思想一直影响着近代医学人文精神的不断演进。针对医学教育出现的派系之争,伍连德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了“对内部团结之团结也”。在这一时期,医学院校的创办从国立、省立到私立,社会各界力量都在医学教育中有所投入。原上海东南医学院创始人郭琦元提出:“夫医者为生身强之学,国家之强弱胥于是系。”医学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从1912年的10余所院校百余名医学生到1937年的30余所2930余在校生。

#### (二)不可替代的服务关爱精神

在传统医学提出的“悬壶济世”的基础上提出医学是“小之可以挽救人命,充其极可以左右医学之前途”,关系到民族的健康,关系到民族的复兴,相比于其他职业具有其不可替代性。科学救国和学医救国的思想在医学教育者和医学生中具有高度统一的认识,将医生的责任区划为短期即是医治患者的病痛,长期是促进人民的健康水平。更有李振翩提出的“医与其他职业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直接为人类谋幸福,它一切的设施都是关于人类。”1925年,兰安生在北京建立了以第一卫生事务所为依托

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sup>⑧</sup>,之后,1932年设立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sup>⑨</sup>为全国最高的卫生技术机构,下设九个系。在九个系中已经有负责城市市政工程与住房卫生工程设计的环境卫生系和已经负责职业病防治与工业生产伤害预防的工业卫生系<sup>⑨</sup>。这些机构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从侧面体现出医学发展对人的关怀和关爱,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也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服务精神。这种不可替代的服务关爱精神,将医学人文精神诠释为“应以最大之努力,来共同工作,以求个人与全民之健康,得以推进。”<sup>⑩</sup>

#### (三)良性竞争、和谐共赢的行医精神

我国近代西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由完全的依靠外部导入逐步转变为内部自主发展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个人留学求学的医学体系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派系之争”,主要存在于“英美系”和“德日系”之间。学术界争论无疑是有利于医学的进步发展,为了促进医学界的学术争论与交流,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并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本同时发行,为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中华医学会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中,宣布学会的宗旨为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在西医传播的过程中,中西医的地位斗争也伴随了很长时期。在二者的争斗中,西医开始自我反思本土化,中医在借鉴西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这充分反映了我国近代西医发展中医人文精神的传承,在吸收西医文化和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外兼修与和谐并生的面貌。

#### (四)“健康国民”的健康教育理念

国民的身体强健是国家强健的基础,医学教育和西医发展的对象不只是医生还包含普通民众对于医学的理解。西医的发展和西医医生的增长只能是技术积累,更需要民众对于医学知识的了解和对于科学清醒的认识。西医被中国人称为“现代医学”,医生具备现代医学的技术,也需要民众具有现代医学

①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第一所医学学校是李鸿章依靠马根济(J. K. Mackenzie)创办的天津医学馆(后更名为“北洋医学堂”),1907年岑春煊也在军队中创办随军医院和医学堂,这些医学院校是为军阀培养的军医而不是为人民所服务的医生,我们在探讨医学人文精神中并不将此规划在内,我们以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为我国近代西医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发轫。

② 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1933年更名为中央卫生实验处,隶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公共卫生和防疫问题的研究等工作,同时负责指导各省市成立卫生实验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主要负责战时卫生防护问题。

③ 《卫生署刘署长瑞恒演词》,又名《吾人之责任》,载于《中华医学杂志》。为时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医学学会上的演说讲话稿件。

发展下的疾病思维。国内西医教师和医生在传播发展西医的同时也在向民众传播医学科学知识,要民众树立起一个正确的就医观念,而不是“多找几个医生病就快速治愈”。陈志潜在定县实验区担任卫生教育部主任期间,从基础做起开始对民众的医疗卫生观念进行适当引导,在引导教育中摒弃封建迷信观念,普及医学科学观念<sup>[10]</sup>。在更早的时间里,国内西医医生和教师便开始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给民众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报刊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在1912~1949年,国内创办医药报刊多大501种,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34种学术报刊创办<sup>[11]</sup>。众多医药卫生报刊的创办对于中国人民的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提出要推及卫生教育的过程中,医师和学术团体积极承担应有之责任,如多个学术团体合办的中华卫生教育会<sup>①</sup>对于卫生教育的促进和发展。

#### (五)西方人文主义理念

“新文化”运动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为知识分子所了解。外籍教员和留洋归国人员将西方的人文精神融入到改革的医学教育中,特别是临床实习中的人文精神教育。1922年协和医学院已开设医学伦理与法律、医学史的讲座课程,将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将尊重人的尊严和生命等人文关怀精神融入到医学中。1928年震旦大学宋国宾教授撰写的《医学伦理学》将西方的伦理学思想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将中国传统美德融入到西医的诊治过程中<sup>[12]</sup>。这一时期医学人文精神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传入和医学伦理学等课程的讲授,形成了具有传统中医中的“仁术”和西方传入的“人文主义”。

#### 参考文献

- [1] 宫福清,戴艳军. 正确认识医学人文知识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5):103
- [2] 段振东,张前德. 论医学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承接[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4):267-270
- [3] 郭霭春.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509
- [4]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1
- [5] 郭霭春.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4
- [6]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23
- [7] 礼露. 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 [8] 王勇. 兰安生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3-17
- [9]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70
- [10] 陈志潜. 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5
- [11] 潘荣华.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0
- [12] 张鸿铸,何兆雄. 中外医德规范通览[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370-379

##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of Humanism in the western medicine development of China

Ye Zihui, Wang Zhao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TWestern medicine,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recent hundred years, has replaced the dominance 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d a subversive effect on people's concepts towards medical. As western medicine spreads,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bout humanistic spirit eliminated, absorbe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eing adapted to it. Through explor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western medicine spread into China, summing up experiences, and then medical humanistic spirit can be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medical humanistic spiri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western medical spread

①中华卫生教育会,1920年成立,由中华医学会、博医会、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基督教教育会共同组织。毕德辉博士担任教育会主任,胡宣明博士担任书记。